

魏晋玄学与美学

邬锡鑫 著



美

贵州教育出版社

魏晋玄学与美学

张其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魏晋玄学与美学

邬锡鑫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玄学与美学/邬锡鑫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650—645—4

I. 魏… II. 邬… III. ①玄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②美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235. 05②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674 号

魏晋玄学与美学

邬锡鑫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0.125 印张 255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645—4/B·6 定价: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永安寺街 29 号 电话:6618255 邮编:550004



邬锡鑫，当过下乡知青，当过农村小学教员，在坎坎坷坷的自学之路上艰辛地跋涉着。1979年考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哲学专业，学成后在该院从事哲学、美学研究工作和刊物编辑工作。业余时间，对文学创作也颇有兴趣。主要作品有《直接联系也是有中介的——兼谈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的关系》、《“形象思维”的含义探讨》、《从“意象”到“意境”——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发展史的一条线索及其启示》、《一个艺术合题：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论韵味的内涵及其生成因素和文化价值》等论文和《乐府选注》、《了犹未了》（长篇小说）。觉得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神游哲学和艺术的天地。

自序

十多年前，我在撰写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的论文时，对魏晋玄学给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是文艺美学带来的影响就有了一些感触，曾经萌生了深入系统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念头。但我手上一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活儿，使我难以有成块的时间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直到前些年我才下决心放下了正在做的某些事情，设法在每天挤点时间来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于是才有了这本书的写作。写这本书，我得到了两点深切的感受。

第一点感受是，要把自己的作品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生命价值意识与精神价值意识作为文化的内核，是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本。懂得这一点，将自己的作品与自己生命意义的体现联系起来，你在进行研究和写作时，就会尽力排除世间一切利益的纠缠，也会尽力排除社会某些因素的重压。于是，你就不会急于求成，就不会迷惘浮躁；你就感到了心性的自由，就感到进入了展现自己生命之美的境界，感到你形成的每一个想法，写就的每一个字词，都显示着你的生命的活力。至于你的作品会不会在人们那里得到认可，得到好评，或者得到哪个级别的奖励，你自然都不会去计较了，因为你已经明白，你已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历史，你的作品作为你生命的延续定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浮沉；尽管你不知道它会不会被历史的浪潮冲刷得不见了踪影，你也不会觉得对社会欠下了一份情。当然了，学者也是人，也要经受尘世的纷扰，承担生存的压力，使你常常感到日子的窘迫，这就由不得你不将身份的提高、荣誉的赢

得、财产的增添,与你对学问的探究联结起来。那么,从古至今,所有忘却了自身贵贱、荣辱、贫富,不在乎自己的成败得失,不理睬人家的褒贬喜恶,真正将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作为自己生命意义的展示的学问家、文学家、艺术家们,就尤为值得我们敬佩和尊重了。在他们留下的作品中,我们便看到了他们的生命的光彩,感受到了他们的生命的永久的魅力。

第二点感受是,做学问自始至终一定要有“静气”。保持心理的清虚明静,屏蔽来自客观和主观的各种各样因素对自己心境的袭扰,是把学问做得下去的关键。陆机《文赋》所云“收视反听”,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云“凝神静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云“寂然凝虑”,虽然都是讲艺术创造的构思时必须澄怀虚心,但无疑也适用于做学问时心态的调整。我承认,当今时代,各种社会竞争异常激烈,在这样的情状下,做个学者尤为不易。在你的心外,各种利益的对立、倾轧、协调、交换、融合,使得人们不停地耗费、聚集、再耗费着自己生命的能量。人世间每一刻都那么纷乱,那么沸腾,那么喧嚣,使你总感到有翻卷着的浪涛撞击到你的心上,由不得你的心里不起一点波纹,以至你无法去真的“甘于寂寞”。可是,谁叫你想做个学者呢?做个真正的学者,你既要食人间烟火,又得要有沉静心境。很难吗?很难。但至少有一点你可以做到,就是不去与人攀比,不去凑热闹,不去赶时髦。管人家弄得了多少有钱资助的课题;管人家成果码了多少堆垛;管人家搞研究怎样红红火火,如何“吹糠见米”;管人家制造了什么“学术泡沫”,何种“人间奇迹”,就是说,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你做学问时都不能够心躁气浮,想入非非。倘若你的神志进而深深地沉入你做的学问之中,保持相当的定力,以至达到明代吴宽《书画荃影》所说的王维创作时那种“胸次洒脱,中无障阻,如冰壶澄澈,水镜渊停”的境界,那么无论你做的学问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是成是败,你都是真正显示了自身生命意义的学者。

显然,以上两点感受是相互联系着的,或者说就是同一的。不可否认,学术研究同文艺创作一样,能影响人们的精神活动,使人们增长知识智慧,提高认识能力,获得心灵愉悦,陶冶心性情操等等,并且这种对人们精神活动的影响甚至能够转化成人们物质活动的力量,因此也就能给学者和作家艺术家带来荣誉、地位和物质利益。然而,对于学者和作家艺术家个人来说,学术研究也好,文艺创作也好,原本却是超越物质功利的。老子撰《道德经》,庄子作《逍遥游》,屈原吟《离骚》,司马迁写《史记》,王弼搞《老子》注等等,大约都不曾想过要拿自己的作品去谋得什么身份,赢得什么奖赏,获得什么报酬。不用说,他们当中除很少的人外大都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也不可能有现代人生计上的那么多要求,所以现代人很难效仿他们。在历史的演变中,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都逐渐成了谋生的手段,自然要同名呀利呀纠缠在一块,而这就与作为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本质的文化精神对立起来。当你真的将自己的作品看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时,你自然会以淡泊宁静的心神,融入到你的学问探求,你的艺术创造之中,努力用你的作品去展示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生命价值,呈显一种精神的功利;你就会感悟到追求这种精神功利能够长久地沉浸在一种审美享受之中,而这正是对五花八门物质功利的追求所不能比拟的。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得到不能忘怀的感受,我已经很愉快了,也很知足了。这感受已溶解稀释了我紧张思维的劳累,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自己写下的每个字正逐渐圆融。于是,关于这本书,要说的就只有这么一句了:我读了自己乐于读的书籍,我写了自己乐于写的东西,如此而已。

邬锡鑫

2005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魏晋玄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1)
第一节 形成于社会动荡中的魏初清谈·····	(1)
第二节 汉末经学的衰落与魏初思想的变迁·····	(6)
第三节 正始改制与玄学兴起·····	(10)
第四节 魏末两晋的社会状况与玄学的发展·····	(13)
第二章 魏晋玄学与文化变革·····	(20)
第一节 魏晋玄学与人们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	(21)
第二节 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嬗变·····	(26)
第三节 魏晋玄学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34)
第三章 以人道自然观为基础的美学·····	(51)
第一节 从仁学到道论·····	(52)
第二节 从天道到人道·····	(60)
第三节 新的美学基础:人道自然观·····	(70)
第四章 审美意识的变迁·····	(81)
第一节 沉浸于清谈之美·····	(84)
第二节 倾心于人物之美·····	(91)

第三节 怡情于山水之美	(99)
第四节 划时代的美学意义	(109)
第五章 文学艺术的自觉	(113)
第一节 文学艺术之美的创造	(114)
第二节 文艺美学理论的自觉	(135)
第三节 展现全新的文化意义	(170)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发展史三条线索的形成	(180)
第一节 从“言志”到“缘情”	(181)
第二节 从“形似”到“神似”	(205)
第三节 从“喻象”到“意象”	(237)
第七章 中国美学史的灿烂篇章	(261)
第一节 划时代的美学贡献	(262)
第二节 中国古代美学殿堂里的特殊地位	(285)
第三节 深刻的理论启示	(297)
后记	(316)

· 第一章 ·

魏晋玄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魏晋玄学与美学的关系,讨论玄学影响下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和美学观念发生的演变,必须着力对魏晋玄学的根本思想所形成的文化背景进行多角度的考察,这就必须首先对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缘由进行多方面的探究。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新潮和哲学新派,同任何思潮和任何学派一样,其形成绝非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社会的大动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经学的衰微和思想的变迁造成的文化变革,为滋生玄学提供了历史的土壤,使得玄学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揭示魏晋玄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我们认识魏晋玄学在文化变革中带来的新的思想面貌和新的社会风尚,并进而研究魏晋玄学对魏晋六朝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形成于社会动荡中的魏初清谈

魏晋玄学脱胎于魏初的清谈,而魏初清谈则形成于社会的动荡之中。这种社会的动荡构成了魏初清谈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

景,其形成原因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政治黑暗和党锢之祸造成的深重的社会危机。

东汉中期以后,豪族、世族政治势力进一步扩张,更加紧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在朝廷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而皇帝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则只能扶持和依靠宦官集团打击外戚势力。到了东汉末期,宦官集团与外戚势力的争权夺利越演越烈,大权最终完全落入宦官之手。由于执掌重权,宦官集团越加专横肆虐,因而更激起朝野的愤慨和痛恨,于是形成以宦官为代表的浊流同以士大夫知识分子(即士人)为代表的清流的较量。清流虽然得到某些反对外戚或宦官专权的官僚的大力支持,并与这些官僚结成联盟,但终究被宦官集团镇压了下去,因而出现了两次党锢之祸。宦官和外戚两股势力长期的残酷争斗,造成了政局不稳、国势衰颓的局面,陷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致使农民起义频仍,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给东汉政权以致命的打击。黄巾农民起义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的暂时联合中被镇压下去后,东汉王朝气数已尽,各豪族军事势力拥兵割据,于是出现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局面。随着曹操、刘备、孙权势力的扩大,经过赤壁之战后,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三方错综复杂的战争不断发生,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长期分裂和动荡。

曹操死后不久,其子曹丕受禅于汉献帝而称魏文帝。为了防止东汉外戚势力和宦官集团交替专权的重演,曹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特别是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以依靠元老派官僚及依附于他们的士人加强中央集权。“九品中正制”的实施,解决了战乱中庶民流徙后难以“察举”、“征辟”人才的问题,补充了各级政府机构中缺少的官吏。但负责选拔人才的“中正”全被元老派官僚集团所掌握,他们不以人的才能德行优劣,而以出身门第高低为评定人物的标准,因此官吏的选拔和升降便完全被元老派官僚所控制,这就必然堵塞广大士人的仕途,而门阀世族势力也便在无需依靠外戚

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极力压制甚至迫害对其不满的士人。元老派官僚势力的膨胀,随着其政治代表、在曹操当政时便被委以重任的司马懿地位的步步上升,经魏明帝到魏齐王芳时,已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魏明帝曹睿有遗诏,要曹魏宗室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其子齐王曹芳。曹芳继位时尚年幼,身为大将军的曹爽掌执大权,对司马懿权势的扩张深感忧虑,只能在司马懿代表的元老派官僚之外去寻找依靠的力量,便采纳丁谧建议,将司马懿由太尉调任太傅,使其位在三公之上而又失去军权;同时,启用曹睿当政时被罢黜的清谈名士何晏、邓飏、丁谧、李胜、毕轨等人,排挤司马懿势力。而司马懿因其资历和地位,则在元老派官僚中有很高威望,并依靠九品中正制扩充着自己的实力。曹爽为控制幼主,亦企图垄断权力,便将何晏等人“任为心腹”,并采纳他们的主张“屡改制度”^①。作为掌握朝政的实权人物,曹爽既要防止出现东汉那种外戚与宦官明争暗斗、交替专权导致社会动荡的局面,又要对付代表元老派官僚利益的司马懿势力对曹氏政权的威胁,则只能依靠广大士人的力量,因此“屡改制度”即对以九品中正制为中心的若干官僚、行政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从魏初至正始时期,曹氏和司马氏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始终没有停止过,使得曹魏政权总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也就更加看不到社会稳定的希望。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曹魏初期至正始年间社会动荡的产生,与东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社会动荡中,魏初清谈逐渐形成并逐渐向玄学化的方向发展着。

魏初清谈是从汉末清议演变而来的,汉末清议形成于“察举”这种取士制度的实施中。“察举”制度建立于西汉,其任务是通过“乡闾评议”向政府举荐孝廉和茂才,政府则根据被举荐者的品行

^① 《晋书》卷一《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页。

和才能而授其官职。这种制度的推行,的确曾为统治者选拔了一些忠君爱国、清廉方正、干练精明的官吏。同时,乡闾评议对官吏的为非作歹行为也曾起过一些舆论监督作用,有利于在社会上倡导廉正清明的道德风尚。但随着统治者的昏聩,这种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东汉末年黑暗的政治现实中,“察举”制度则完全蜕变为外戚或宦官扩张自己势力的政治工具。桓、灵帝时,豪门望族常常操纵着地方各级行政长官,也就往往能利用官府中掌管考核大权的官吏,控制地方的察举。而主持评议的人又都出自当地世家豪族,因而所选举出来的人便基本上是他们的子弟。这样一来,出身于庶族寒门的士人便被排挤在仕途之外,他们在不愿趋炎附势与当权集团同流合污的某些官僚的支持下汇聚起清流,与宦官集团及其所培植的势力即浊流相对立。这种对立,随着社会腐败的加剧而日趋尖锐。清流的出现,使察举中对人物的德行和才干的品评逐渐演化出对政治时事和社会风气的评议,这种评议史称清议,在清议中产生了一批对社会很有影响力的名士。广大士人对名士敢于鞭挞腐败朝政的精神风范大加赞赏和褒扬,并尊威望极高的名士为清议领袖。这样,在清流中便树立起“倜傥”风气。“倜傥”风气对于动摇宦官集团的暴虐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深得民心,所以两次党锢之祸也无法将其湮灭。可以说,“倜傥”风气正是清议生命力之所在。

“倜傥”风气在士人阶层盛行,不仅对社会倡导了不畏权势威压、敢于批评朝政的气概,而且还逐渐演化出对人物个性风度、人格德行的品评。清流名士无论有官职者,还是未入仕途者,其人格个性都同样受到士人阶层品评人物时的注重和褒扬。汉末士人所欣赏的某些名士“多骇流俗”^①之不羁礼法的个性和新颖奇异的议论,对魏晋名士旷达狂放风气的流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对人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三《戴良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73页。

物精神节操、个性气质品评的同时,对人物的才华予以重视,是很自然的事情。汉末清议更为赞赏的是人物的天赋,这样,神童的故事也就广为流传,而清流名士心目中神童的聪慧则主要是独特的论辩之才。这实际上是在倡导提高以巧言进行答辩的能力,因而直接影响到名士之机变应对谈风的形成。

清议发展到魏初,不仅保留着品评人物气质、品性、才干的风气,而且还演化为关于人物评价标准的论辩,从而形成了早期的清谈。汉末清议对人物个性的欣赏和对人物才华的推崇,与当时士族知识分子在黑暗政治下企图保持自身独立人格和发挥积极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社会长期动乱,军阀连年混战,各派政治势力急需通过尚存的察举方式物色人才的情况下,完全改变了评议人物以德为先的模式,对曹操“唯才是举”用人政策的产生和推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也在东汉末年诱发和助长了浮华虚伪以沽名钓誉甚至相互吹捧以拉帮结派的社会风气,导致名实不符、名虚实枉这种普遍现象的形成,因而使得一些较有文化理性和政治远见的人士极为不满。如左雄批评当时的察举“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①;崔寔在《政论》中对“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毫厘,而祸福差千里”的情况表示深深的忧虑;而王符则著文强调名与实应相符,指出“有号者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②,乃为社会的正道。虽然面对大量名实相悖的现象,这些有识之士的声音显得很微弱,但它在汉末清议对人物的品评演变为魏初对评价人物标准的论辩清谈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后汉书》,第2017页。

② 王符《潜夫论》,〔清〕汪继培《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

作为实权人物的曹操顺应统一大业的需要,强调“名实相副”^①,既好法术,又重人才,“而天下贵刑名”^②,才使社会对人物的品评和察举形成注重名与实符的风气。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魏文帝时刘劭总结了如何循名责实评议和选拔人才的经验和方法,并在研究从名实相符原则出发鉴识和任用人才的一般标准以及探讨人物的精神根本和才性的关系中,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辩名析理的哲学方法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劭写下的《人物志》看来,围绕评价人物标准问题而展开的清谈论辩须掌握一定的技巧、方法和避免发生错误,其就此所作的阐述完全以对名理的独到的深入的辨析为基础,这不仅为名理学的研究拓开了新的思路,也使得源于汉末清议的魏初清谈在发展中更加注重从对个别现象的讨论进入对一般理论的探索,从而对正始玄学的产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汤用彤先生指出:“《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陷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③《人物志》对时势变化中学理的自然演进及其导致的正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逻辑环节。

第二节 汉末经学的衰落与魏初思想的变迁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士族与朝廷的矛盾加剧,外戚

① 《三国志·魏书·王脩传》裴松之注引曹操与王脩书,见《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7页。

②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晋书》,第1317页。

③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和宦官势力相互倾轧,使得统治集团的地位严重动摇,因而作为思想统治工具的经学也逐渐趋于衰微。

产生于西汉的经学,通过对古代典籍《尚书》、《诗经》、《周易》、《周礼》、《春秋》的注解和阐释,全面发挥了儒家的思想。武帝时中央集权加强,政治较为稳定,经济逐渐繁荣,迫切需要对社会的思想进行控制,于是武帝即位不久便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董仲舒的大力推动下,经学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王朝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汉王朝统治权力的不断巩固,经学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从西汉到东汉,今文经学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古文经学虽未立于官学,但从西汉末期起便流行于民间,至东汉时名家辈出,使今文经学的影响日益衰微。对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争论的焦点和各自的特色及弊端,周予同先生概括为:“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①汉武帝定儒家思想为一尊后,经学造就了庞大的士族队伍。一方面,士族以经学为巩固皇权提供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一大批士族知识分子对皇权控制下的官僚政治中违背六经的现象极为不满,并加以鞭挞,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同皇权发生矛盾。东汉末年,社会愈加污浊,士族与被范文澜先生称作“鲠直派”^②的官僚们如李膺、陈蕃等结成联盟,对朝政的腐败进行猛烈的抨击,因此,士族与皇权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许多士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经学大师在党锢之祸中遭到镇压和摧残,再加上经学长期在烦琐、僵化、陈腐的死胡同里打转,很不适应士族抗争的需要,因此,经学必然地走向了衰落。

①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② 参见《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182~193页。